

管中窺豹：16 - 18世紀 中國人的西洋觀與澳門

趙春晨*

16-18世紀，澳門在中西交往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絡繹而來的西方商人、傳教士、殖民者在中國大陸唯一合法的立足點，而且也是仍然基本處於對外封閉狀態下的中國人得以接觸和窺見西方事物的主要管道。因此，早期中國人西洋觀的形成，與澳門有著極密切的關係。此時期內中國人在對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認識上所取得的若干進步與局限，都直接或間接地同澳門有關。

16-18世紀，澳門在中西交往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絡繹而來的西方商人、傳教士、殖民者在中國大陸唯一合法的立足點，而且也是仍然基本處於對外封閉狀態下的中國人得以接觸和窺見西方事物的主要管道。因此，早期中國人西洋觀的形成，與澳門有著極密切的關係。此時期中國人在對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認識上所取得的若干進步與局限，都直接或間接地同澳門有關。澳門對早期中國人西洋觀上的這種影響，甚至持續到了19世紀的前期，即鴉片戰爭之前。因此，有對其進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早期中國人西洋觀的漸進與澳門

16世紀之前，中國雖已使用“西洋”這一地理稱謂，甚至有鄭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壯舉，但當時所講的“西洋”，實是指南海西部和印度洋地區，並非歐美和大西洋。1517年，當葡萄牙（也是整個歐西世界）的第一個使團來華時，明朝政府上下皆不知其來歷和葡國的所在。《明武宗實錄》記述當時的情形道：“佛郎機國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

封，並給勘合。廣東鎮巡等官以海南諸番無謂佛郎機者，況使者無本國文書，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請。下禮部議處，得旨：“令諭還國，其方物給與之。”⁽¹⁾其後，西班牙、荷蘭等國人相繼來華，所遇到的情形也和葡萄牙相類似。16世紀後期，嚴從簡著《殊域周咨錄》一書，介紹海外諸國，雖有“佛郎機”條，卻仍不知其來歷，稱：“別有番國佛郎機者，前代不通中國，或云此喃勃利國之更名也。古有狼徐鬼國，分為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機國與之相對。”⁽²⁾時人還將葡萄牙、西班牙兩國人混為一談，皆稱之為“佛郎機”，而不知區分。至於荷蘭，明代中國人稱其為“紅毛夷”或“紅毛番”，萬曆年間的《野獲編》一書寫道：“紅毛夷自古不通中國，亦不知其國何名，其地何在。”⁽³⁾這些都表現了當時國人對歐西世界茫然無知的狀況。

此後，隨著西方殖民者的絡繹東來，中國人開始認識歐西世界。17世紀前期，閩人張燮著《東西洋考》（1617年刊印），其中有《西洋列國考》四卷，雖然主要講的仍是南海和印度洋一帶國家的情況，但在“西洋列國”的“麻六甲”、“東洋列國”的“呂

*趙春晨（1942-），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廣州大學嶺南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近代中外關係史、嶺南文化史。

宋”、“蘇祿”、“美洛居”等條目下，已有若干關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在東南亞進行殖民活動的記述，並已開始使用“大西”一詞，如稱：“有佛郎機者〔按：此指西班牙〕，自稱干絲臘國，從大西來。”⁽⁴⁾該書卷六《外記考》中還有“紅毛番”條目，專門記述東來荷蘭人的情況；“餉稅考”、“逸事考”中也有關於葡萄牙等國來華活動的片段記述。⁽⁵⁾17世紀後期，廣東學者屈大均在其所著《廣東新語》（1689年初刊）的《地語》中，專列“澳門”一條，比較詳細地記述了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書中稱之為“澳夷”、“番人”或“西洋舶夷”）的衣食住行、宗教信仰、商業貿易等情況。該書〈器語〉、〈舟語〉中，還介紹了西洋“大銃”、“機銃”等武器和船隻（“洋舶”）的性能，以及荷蘭（書中稱之為“賀蘭”或“紅毛”）等西人在中國沿海的活動。這時中國人的西洋觀剛剛產生，對西洋的瞭解祇能是隻鱗片爪，認識頗多想象成份，錯誤甚至荒誕不經之談比比可見。如張燮《東西洋考》中寫道：“佛郎機在爪哇南，（……）嘉靖初，佛郎機遣使來貢，行使皆金錢。其人好食小兒，每一兒市金錢百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之。其法以巨鑊煎沸湯，以鐵籠盛小兒置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去苦皮，其兒猶活，剖腹去腸胃，蒸食之。”⁽⁶⁾屈大均《廣東新語》中稱，居澳葡人：“男子不得有二色，犯者殺無赦。女入寺〔按：指天主教堂〕，或惟法王〔按：指天主教主教〕所慾。與法王生子，謂之天主子，絕貴重矣。”“紅毛鬼所居大島在交趾南，蓋倭奴之別種也。”⁽⁷⁾

18世紀是中西交往進一步展開的時代，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瞭解明顯增多，認識也有所提高。18世紀30年代清朝官方編纂完成的史書《明史》中，已載有“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四國傳，比較詳細地記述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的情況以及來華天主教傳教士的活動。該書還介紹了由明季來華傳教士利瑪竇、艾儒略等人所傳入的關於世界分為五大洲的地理知識，雖然認為“其說荒渺莫考”，但又承認“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⁸⁾，因

此“大西洋”、“歐羅巴洲”、“歐羅巴諸國”等地理辭彙，在書中已頻見出現，與“西洋”一詞時相混用，表明傳統的“西洋”地理概念已經逐漸被新認識所取代。與此同一時期出現的國人介紹海外情況的著作《海國聞見錄》（陳倫炯著），已單列〈大西洋記〉篇，記述歐洲、非洲一些國家的情況，以與書中的〈小西洋記〉主要介紹南亞、西亞、中亞諸國相區別。⁽⁹⁾稍後，18世紀中葉，由兩名曾經擔任澳門同知的清朝官員印光任、張汝霖編著的《澳門記略》一書，對居澳西人（主要是葡萄牙人）的情況作了更為全面、翔實的記述，包括他們的體貌服飾、生活起居、宗教信仰、習俗風尚、物產器具、船炮技藝、語言文字等。書中所述及的歐西國家包括有佛郎機（葡萄牙）、干絲臘（西班牙）、賀蘭（荷蘭）、意大利亞（意大利）、英吉利（英國）、弗郎西（法國）、瑞國（瑞典）、璉國（丹麥）等。該書還附有以漢字註葡文讀音的〈澳譯〉一篇和澳門〈男蕃圖〉、〈女蕃圖〉、〈三巴寺僧圖〉、〈洋舶圖〉等插圖二十一幅，便於人們學習葡語以及形象地瞭解居澳西人的生活。

到18世紀後期，由清朝官方編纂的典籍《清朝文獻通考》和《清朝通典》（成書於1786-1787年），對於歐西國家和地區記述的範圍和內容，又有明顯的擴大。《清朝文獻通考》中，專列條目記述的歐西國家為“意達里亞”（意大利）、“博爾都噶爾亞”（葡萄牙）、“英吉利”（英國）、“干絲臘”（西班牙）、“荷蘭”、“佛郎機”（法國）、“瑞國”（瑞典）、“璉國”（丹麥），其它附記的國家和地區有“厄勒祭亞”、“羅瑪尼亞”、“翁加里亞”、“波羅尼亞”、“莫斯科未亞”、“大尼亞”、“諾而勿惹亞”、“雪際亞”、“鄂底亞”、“伊西巴尼亞”、“熱爾瑪尼亞”、“博厄美亞”、“拂朗察”、“法蘭得斯”等。《清朝通典》中列條目記述的歐西國家與《清朝文獻通考》大致相同，唯“佛朗機”改成了“法蘭西”（仍指法國）。對這些數目眾多的“歐羅巴州”國家和地區，兩書參考本國文獻和一些西人著述分別介紹了其地理方位、自然和人文情況以及它們與中國的交往等。

從上述一些頗具代表性的著述與言論可以看出，在16至18世紀的二百多年裡，中國人對歐西世界和歐西文化從無知到稍有所知，西洋觀有了若干進步。而這種進步，與澳門的存在實有極密切的關係。因為：

一、澳門是此一時期中國人得以直接接觸和窺見西方事物的主要管道。16-18世紀，中國正處於封建社會的晚期，明清政府的海外政策雖然前後有一些變化，但基本傾向卻是越來越嚴厲的閉關鎖國。由於實行閉關政策，中國同西方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受到諸多限制，西人祇能在被嚴格限定了的範圍裡進行商務活動和與官府指派的華人接觸。然而澳門因為得到明清政府的允許，成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眾多西人得以在此立足，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宗教信仰、風土習慣生活與活動，多方面展現了西洋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另一方面，澳門又是明清政府管轄之下的土地，不僅澳門當地居住有不少華民，設有中國的官衙，而且不斷有中國官員來澳巡視，附近地區的華民也時常湧入習教或謀生。因此，澳門成為此一時期中國人直接接觸和觀察西方事物的一條主要的管道，國人有關西洋的知識與認識，許多正是通過在澳門的直接觀感或閱讀有關澳門的奏報、書冊而得來的。

二、澳門是此一時期中國有限吸收西洋科技的主要來源地。出於戰爭、修曆等方面的實際需要，明清政府這一時期曾十分有限地引進了一些西洋的科學技術，例如西洋火炮的使用與製作、曆法的修訂、地圖測繪等。這些引進活動，有的直接在澳門進行，有的則是利用澳門的科技力量（如調取修曆人材入京服務等）。以購置、倣製武器為例，當時西洋各式火器在澳門駐軍中都已有所配備，同時澳門也是當時西方人在中國土地上從事西洋火器製造、轉運和提供相關技術的主要場所。晚明朝廷在同後金的戰爭中，曾幾次從澳門定購西式火炮和招募炮手。清初在嶺南建立的南明永歷政權，雖然時間短暫，對利用西洋火器也頗為重視，曾派龐天壽陪同耶穌會士畢方濟赴澳門，代表永歷政權向葡人求援。而且，這一時

期已有中國工匠在澳門參與西洋火器的打造，學習製造技術。

三、澳門作為此一時期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教中心和耶穌會士入華的基地，在西學東傳中起着橋樑作用。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採用“學術傳教”的策略，在傳教的同時，進行了大量的譯書講學和科技方面的活動，是這一時期在華傳播西學的主要角色。這些來華的耶穌會士，一般都是先到澳門，在澳門聖保祿學院接受培訓，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熟悉中國的情況，然後進入內地活動。他們到內地後，仍與澳門保持着密切聯繫，接受澳門教會的領導和經費上的資助，一旦遇到挫折或教案，也以澳門為庇護所。因此，澳門是耶穌會士入華的基地，西學能夠在這一時期傳入中國，並對中國文化以及人們的西洋觀產生一定的影響，離不開澳門所起的橋樑作用。

早期中國人西洋觀的局限與澳門

16-18世紀中國人的西洋觀雖然有了若干的進步，但是其局限性是十分明顯的。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有關西洋的知識始終支離破碎、訛誤多端。以地理知識為例，直到18世紀末，中國人對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等西洋傳教士所介紹的世界地理知識仍然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清朝文獻通考》中寫道：“意達里亞人所稱天下為五大洲，蓋沿於戰國鄒衍稗海之說，第敢以中土為五洲之一，又名之曰亞細洲。而據其所稱，第五洲曰墨瓦蠟泥加洲者，乃以其臣墨瓦蘭輾轉經年，忽得海峽互千餘里，因首開此區，故名之曰墨瓦蘭泥加洲。夫以千餘里之地名之為一洲，而以中國數萬里之地為一洲，以矛刺盾，妄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國風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華所及者，雖荒遠狃獠，水土奇異，人性質樸，似或有之，而即彼所謂五洲之說，語涉誕誑，則諸如此類，亦疑為剿說謬言。”⁽¹⁰⁾ 乾隆末年另一部官修圖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789年寫定），對艾儒略的《職方外記》和南懷仁的《坤輿圖說》兩

書的評論分別是：“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疑其東來之後，得見中國古書，因依倣而變幻其說，不必皆有實跡。”⁽¹¹⁾即都把世界五大洲知識當作是西人妄誕之說，不予承認。對歐西國家的具體分佈與方位，時人也是不甚了了。《清朝文獻通考》中將意大利、葡萄牙、英國、西班牙、荷蘭、法國、瑞典、丹麥等歐洲國家皆列為中國的南裔，而《清朝通典》卻說其中的意大利、葡萄牙在中國西面。⁽¹²⁾至於將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相混、英國與荷蘭相混、法國與葡國相混等張冠李戴的現象，在當時的官私記載中更是所在多有。

第二，將西洋國家視同中國古代的朝貢國，極力將其納入傳統的朝貢體系之中。在16-18世紀的中國人的眼裡，無論是先期來華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還是後來居上的英、法等國，全都是天朝“畏威懷德”的朝貢者，必須也祇能按照傳統的朝貢體制加以對待和管理。記載有上述西洋國家情況的《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開篇即言道：“臣等謹按：大地東西七萬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其緣邊。濱海而居者謂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裔之為言，邊也。三代以降，中原幅員視主德為廣狹；四裔遠近，亦隨時轉移。懿惟我國家統一函夏，四裔賓服，列聖經營，宅中馭外，百餘年來，聲教覃敷，梯航遠至。”⁽¹³⁾《清朝通典·邊防》的按語在歷數中國周邊各國和已知的西洋國家之後，也得意地寫道，它們：“咸奉正朔，勤職貢，沐浴於皇仁，殫赫於聖武，輸誠被化，萬世無極。”⁽¹⁴⁾1793年，英國政府以向乾隆祝壽為名，派出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企圖就擴展對華貿易問題同清廷展開談判。但是，清廷仍以天朝上國自居，要求英使按照朝貢禮儀向乾隆皇帝行跪拜之禮，由此引起同英使之間的爭執。乾隆在給負責接待英國使團的清朝官員的上諭中說：“如該使臣於筵宴時，實在叩首則已，如仍止免冠點首，則當於無意閒談時婉辭告知以各處藩封到天朝進貢觀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禮，即國王親自來朝者，亦同此禮。”“朕於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以恩待，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

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此駕御外藩之道宜然。”⁽¹⁵⁾

第三，視西方科技文化為“奇技淫巧”，採取鄙夷和排斥的態度。中國傳統的文化中心主義和“夷夏之防”觀念十分強烈，把華夏之外的“夷狄”統統看作是缺少文化的野蠻人，祇能用華夏文化去改造、同化夷人，而決不允許“用夷變夏”。這種觀念在16-18世紀開始遇到西洋的挑戰，來華西人在武器裝備、機械製造、地圖測繪等方面和天文學、數學、地理學、物理學、醫學等科技領域，已經部分地顯示其先進性和蒸蒸日上的勢頭。然而，國人卻仍然故步自封，普遍地對西方科技文化不屑一顧，或有所顧而又不肯承認其價值。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曾給乾隆皇帝帶來一大批顯示英國科技文化水準的禮品，包括天文地理儀器、船隻模型、槍炮、車輛、羊毛和棉織品、反映英國風土人情的圖冊等，裝載了六百個箱子，卻未能引起乾隆和清朝官員對西洋科技文化的興趣。乾隆在看過英使的〈貢品單〉後，對負責接待的朝臣批令道：“又閱譯出單內所載物件，俱不免張大其辭，此蓋由夷性見小，自為獨得之秘，以誇炫其製造之精奇。(……)着征瑞於無意之中向彼閒談，以大皇帝因爾等航海來朝，涉萬里之遙，閱一年之久，(……)是以加恩體恤。至爾國所貢之物，天朝原已有之，(……)庶該使臣等不敢居奇自炫。”⁽¹⁶⁾結果這批西洋儀器物件遭到冷落，有的在作為玩物觀賞之後很快被廢棄，有的則乾脆放入倉庫封存。送上門的西洋先進科技文化不知去瞭解、吸收和利用，足以反映清廷的愚昧。乾隆年間曾署理香山縣事的張甄陶對西洋科技文化的態度也可作為這方面的例證。他在評論居澳西人情況的文章中寫道：“其人積思於伎巧，若自鳴鐘、千里鏡、風琴、樂響，及泰西水車、水器，皆詭異不可意測，而無濟於實用。”“夷人獨以財行教，此其志不在小，故所至之國，無肯容留。惟明之末造，人心喜異，利瑪竇始入售其說，一時士大夫或震其力學之精詣，或眩其藝事之經奇。其實疇人曆算，古有專司，分秒差歧，亦無大害。至於鳴鐘、風琴、響樂、水車，非奪天巧則不能成，以利

民用全無所濟。徐光啟殫心水器，未有施行。湯若望講究火攻，何嘗一試？惟是壘踞澳門、曆局，聚徒營利而已。”⁽¹⁷⁾可以看出，他雖然承認西人造物積思之深、用心之勤，但卻一概歸結為“詭異不可意測”和“無濟於實用”而加以排斥。

早期中國人西洋觀的這些局限，應當說與澳門也有相當之關係。這是因為——

首先，佔居澳門的葡萄牙人雖然在16世紀曾經擁有海上霸主的地位，但是從17世紀開始就已經走向衰落，逐漸被排擠出了歐洲強國的行列。澳門的情況也與之同步，在經歷最初半個多世紀的繁榮後就已風光不再。18世紀中葉印光任、張汝霖寫的《澳門記略》裡記述道：“澳素饒富，國初洋禁嚴，諸蕃率借其名號以入市，酬之多金，財貨盈溢。今諸蕃俱得自市，又澳舶日少，富庶非昔比。”⁽¹⁸⁾張甄陶在《澳門圖說》中也寫道：“今度其情形，大約昔多而今少，昔富而今貧，昔強而今怯。”⁽¹⁹⁾就是這種由盛轉衰情況的寫照。由於國力漸衰，加上澳門遠離葡萄牙本土和葡印總督所在地，居澳葡人的日常生活又在許多方面必須依靠附近的中國鄉鎮供應，因此葡萄牙人在處理同中國的關係上，盡量採取迎合順從的態度，不惜厚幣卑辭，來換取中國地方官員對其居澳利益的承認。葡萄牙國家的來華使節們，也甘願接受“貢使”的名份，一次次向明清皇帝屈從行跪拜禮。每當葡人試圖在澳門擴大自己的勢力、向中國的國家權力提出挑戰時，中國官方都能夠採用封閉關閘、斷絕糧食類生活必需品供應等辦法，迫使葡人最終“引罪服輸”而就範。這種在對付澳門葡人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優勢狀態和頗為有效的政策辦法，被明清政府和時人加以泛化，當成了處理中國同所有來華西洋人關係的通則。主要通過澳門去認識西方的中國人產生了一種錯覺，即認為西人儘管個個來勢汹汹，但實際都不過是像澳門葡萄牙人那樣“外強而中乾”，祇要採取同對待澳葡一樣的辦法去對付他們，即不足為患，從而放鬆了對西洋的警覺心理。

其次，明清政府雖然允許葡人在澳門居住和擁有一定的自治權利，卻始終擁有對澳門的主權地

位，在澳門行使行政管轄權力，並將澳門視為天朝施恩於外來臣服者的僑居生養之地。無論是常駐管轄還是臨時巡視澳門的中國官員，都是以一種居高臨下、接受臣服者的姿態對待澳門葡人的。清雍正年間奉命到廣東“觀風整俗”的焦祁年在《巡視澳門記》裡，曾記述他訓喻澳門葡官的情況：“招夷長來，為之宣揚聖天子威靈，特命撫綏爾等，以昭柔遠之意，其敬守此土，長享太平。譯使前致辭，為言夷等久需聖化，無可報稱，願率其醜伍，永為外臣。乃北面稽首，歡躍而退。”⁽²⁰⁾乾隆年間曾任香山縣知縣的暴煜在其編纂的《香山縣志》澳門條目下寫道：“澳門僻處海島，（……）有明中葉，西洋彝人借處其地，數百年來生齒日蕃。惟我聖朝，覆載帡幪，故諸酋畏威懷德，萬里梯航，五方輻輳，猗歟休哉！蝟鬚魋結之徒，同遊光天化日中矣！”⁽²¹⁾

這些都是很有典型性的代表。可見，明清政府和時人實際是將澳門視同中國歷史上的“蕃坊”，將對待澳門葡人的政策納入封建時代傳統的體制和理念之中。因此，澳門和澳葡的存在，非但沒有動搖中國人舊有的四夷觀念，還使朝廷和眾多官紳士子繼續沉醉於“四夷賓服”、“用夏變夷”的夢幻之中，並指望用這種傳統的外交模式規範同所有來華西人的關係。

再次，16-18世紀的澳門雖然匯聚了較多的西洋文化，成為中國有限吸收西洋科技的主要來源地和西學東傳的橋樑，但是由於其地理範圍狹小、葡人國力漸衰、天主教會勢力強大等原因，其所承載的西洋文化並不十分豐富，且宗教色彩相當濃厚，一些世俗性的文化教育機構和活動，如新式學校、報刊、出版社等，這一時期在澳門遲遲未能出現。18世紀清廷採取禁教政策和耶穌會被羅馬教廷解散之後，澳門的文化氣息更加淡薄。18世紀末期曾到澳門小住的葡萄牙著名詩人薄卡熱（Manuel Maria Barbosa du Bocage）這樣描寫當時澳門的社會現實——

一個毫無權勢的政府，一個如此潦倒的主教
幾位才德修女，一間飄搖破屋

三所修道院，幾個苦行僧
五千平民和中國基督徒，他們草草修築

一座如此一般的大教堂，如今收容
十四個身無分文的受薪教士
一貧如洗，無數卑賤的娼婦
一百個葡萄牙人，住所有如豬圈

六座炮臺，百名士兵，還有一個鼓手
三個堂區，以木為界
一個無所作為的教區樞理

兩所神學院，一所還破舊不堪
一個凌駕一切之上的議事會
這就是葡萄牙在澳門擁有的全部⁽²²⁾

薄卡熱的詩不無尖酸刻薄之意，但其所反映的澳門在文化方面的慘澹景象卻基本屬實。這種狀況，無疑也對主要通過澳門接觸和認識西洋文化的中國人造成不利的影響。

結語

綜上所述，澳門的存在，便利了早期中國人與西方世界的直接接觸和對西洋的認識，中國人對於西洋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乃至精神文化的最初瞭解，許多都來自於澳門、受益於澳門。但是另外一方面，澳門對於早期中國人瞭解和認識西方世界，又有其局限和不足，中國人透過澳門所管窺到的西洋，往往是見木不見林、見表不見裡、見弱不見強，從而形成早期中國人的西洋觀淺薄、幼稚的缺陷，使其對於西方世界仍基本處於懵懂無知的狀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固然有澳門本身的局限這種客觀上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卻是由於中國的封建制度和在這種制度下國人思想觀念上的封閉與自大所至。從16到18世紀，時間經過了二百多年，與中國發生交往的西洋國家從一個增加到一大批，接踵而至的西洋事物也越來越多，中國人觀

察、認識西洋世界的管道本應當也完全可以大為擴展，然而國人卻仍舊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的目光囿於澳門這一個管道之中，勢必造成管中窺豹的局面。其結果，是妨礙了自己對世界大勢的認識和融入近代世界的步伐，以至於在進入19世紀前半期後，會出現面對西洋強國的大肆侵略猝不及防和茫然不知所措的情況。

這一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

【註】

- (1)《明武宗實錄》卷一五八，正德十三年正月壬寅。
- (2)轉引自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頁2。
- (3)轉引自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頁86。
- (4)〔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中華書局2000年版，頁67、70、89-96、101-102。
- (5)〔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中華書局2000年版，頁127-130、131、248-249。
- (6)〔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中華書局2000年版，頁249。
- (7)〔清〕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1985年版，頁38、483。
- (8)〔清〕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第28冊，頁8459。
- (9)〔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大西洋記》，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
- (10)《清朝文獻通考》，卷二九八，四裔六。
- (1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地理類四。
- (12)《清朝通典》，卷九九，邊防三。
- (13)《清朝文獻通考》，卷二九三，四裔一。
- (14)《清朝通典》，卷九七，邊防。
- (15)轉引自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伐——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頁427-428。
- (16)轉引自林延清、李夢姿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頁295。
- (17)張甄陶：〈澳門圖說〉、〈論澳門形勢狀〉，見田明曜：《香山縣誌》卷八。
- (18)趙春晨：《澳門記略校注》，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版，頁141-142。
- (19)田明曜：《香山縣誌》卷八。
- (20)暴煜：《香山縣誌》卷九。
- (21)暴煜：《香山縣誌》卷八。
- (22)《遙望中國》第1卷頁281。轉引自吳志良：《澳門政治發展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章第1節。